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 《玫瑰之名》中的转型焦虑

荆兴梅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玫瑰之名》以历史书写元小说著称于世,它既有后现代元小说特征,又烛照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社会现实。本文采用文化批评研究方法,对事实与虚构交织的文学文本“去神秘化”和“再语境化”,以此探寻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政治。它聚焦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运动演进的转型期,探索新旧法则交替之际的西欧社会众生相。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城市市民和商业经济应运而生,引发教会内部价值观分流,僧侣阶级的混乱与争斗层出不穷。小说中多次提及罗杰·培根和托马斯·阿奎纳等中世纪文化巨人,他们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以此来反抗教会的腐朽体制。本论文以这些为思辨资源,批驳宗教狂热、知识狂热、语言狂热等信仰激进现象,提倡尊重人性和理性的科学发展的科学观,从而揭示中世纪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玫瑰之名》;中世纪;文艺复兴;转型焦虑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1-0049-08

0 引言

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是意大利学院派作家和符号学家。他才情卓越、著述颇丰,早期著作《托马斯·阿奎纳的美学问题》(*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1956)和《中世纪的艺术与美》(*Art and Beauty in the Middle Ages*,1959)等,为他赢得“中世纪学者”(medieval scholar)的美誉。此后,《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1962)、《符号学理论》(*A Theory of Semiotics*,1975)和《符号学与语言哲学》(*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84)等学术专著问世,使他成为声名远播的文论家和符号学家。他在48岁时开始发表小说,出版了《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1980)和《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1988)等作品,为读者精心烹制了一场场符号学和哲学的盛宴,其作品好评如潮。他从此跻身于大师级小说家的行列。

《玫瑰之名》采用虚实交融的手法,将故事设置于欧洲中世纪后期的修道院,对当时教会中的激进信仰和伦理混乱展开探索,彰显了封建神学向近代人文主义和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语境。在《恐惧与颤栗》(*Fear and Trembling*,1843)中,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认为狂热信仰有悖于伦理道德:信仰是应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可规约、不可解释的激情,它要求人们弃绝最珍贵的东西,来表达对上帝的绝对敬畏和忠诚;而伦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大

收稿日期:2022-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南方女性小说研究”(19FWWB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荆兴梅,女,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荆兴梅.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玫瑰之名》中的转型焦虑[J]. 外国语文,2023(1):49-56.

多数人接受的普适性条约,它约定俗成,因为有利于民族或人性而显现伟大的道德。换句话说,信仰的个体性高于普遍性,完全可以由于一己的信念而不顾一切,做出危害自身或他人的行动。伦理则在普遍性中获得安全感,因合乎人性而高于个体主义,通常远离自私性和极端性(克尔凯郭尔,1994: 30-57)。

《玫瑰之名》中所论及的僧侣文化曾经一统天下,修士们翻译和缮写教义文献、流通知识、传播语言,铸造了所谓的中世纪“千年盛景”。随着教会势力抵达巅峰,其专制与黑暗的一面逐渐暴露,出现宗教狂热、知识狂热和语言狂热等激进信仰的具象化行为。它们禁锢人性、违反伦理,是历史进程中倒行逆施的力量,引起当时有识之士的抗拒和反思。小说立足于中世纪末的社会现实,以字里行间屡次涉及的罗杰·培根(Roger Bacon)、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为进步经院哲学家代表,来呼唤人文精神和理性文明,构建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代。

1 宗教狂热:“触犯理性的荒谬命题”

埃科将《玫瑰之名》置于中世纪后期,力图呈现信仰维系方式和理性维系方式分庭抗礼的局面。如果说人类早期以血缘共同体作为维系方式,形成氏族和部落等社会形态来抵御外敌、谋求生存,那么信仰维系方式对它取而代之,则是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财富积累导致氏族和部落拓展为民族,血缘关系对国家治理和外交再也无能为力,于是信仰维系方式应运而生,试图提供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需求。欧洲基督教文明在12世纪前后进入鼎盛时期,然而貌似稳定的社会格局其实暗流涌动。正如刘建军所言:“信仰维系方式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某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例如某一思想或文化学说必须要受到高度的崇拜,而信奉它的人们必须保证从来不对他们所信奉的东西发出一点点儿疑问。所以,信仰维系方式的本质不是理性的而是敬畏的,不是可以讨论的而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刘建军,2005: 92)可见,信仰维系方式具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必须令人顶礼膜拜、不存任何质疑。但一些宗教知识分子却率先对基督教教义产生怀疑,他们重新对《圣经》进行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倡导一种理性维系方式:信仰值得拥护,但它需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罗杰·培根、托马斯·阿奎纳等人就是当时的集大成者,他们崇尚理性主义伦理观,堪称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起点。《玫瑰之名》不仅在文本中反复提及这几位经院哲学家,还将他们的理念附着在主人公威廉身上,帮助他探寻修道院激进信仰和自相残杀的根由。

《玫瑰之名》中宗教狂热者不在少数,乌伯蒂诺就是其中之一。他本来和威廉同属方济各会成员,两人具备同道中人的感情基础,却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处事理念。乌伯蒂诺原来服务于教廷,他反对教皇并试图重建教会,失败后藏身于这所本笃会修道院,暗中依然是方济各会的忠诚卫道士。一方面,他在宗教迫害和追杀中惶惶不可终日,异常渴望某个天使教皇诞生,时刻担心和防范敌基督降临。另一方面,他的宗教狂热不可遏制,不惜牺牲自身性命来尽忠上帝,憎恨异教徒和非禁欲主义者。威廉对他如此评述:“乌伯蒂诺,你热爱上帝,痛恨邪恶,精神都是强烈的。我的意思是说,天使般的人的热情和魔鬼的热情几乎没有不同,因为二者都是愿望极端激动的产物。”(埃科,1987: 62)在威廉看来,乌伯蒂诺的宗教极端主义很危险,容易滑入偏执和反沟通主义的深渊,从而等同于魔鬼的疯狂,于己于人都有极大伤害。威廉用辩证法来看待问题,强调天使和魔鬼、激情和癫狂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却受到乌伯蒂诺的否认。辩证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得到长足发展,而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演进,至少部分归功于

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精髓,新兴资产阶级借助它来撼动封建宗教神学文化(刘建军 67)。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恩格斯, 1972: 468)人文主义精神是辩证法固有的特点,由此可见乌伯蒂诺笃信宗教之外别无他物,而威廉的现代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赞同亚里士多德视“笑”与严肃是一体两面,都能“触犯理性的荒谬命题的虚假权威”(埃科, 1987: 152)。

威廉推崇罗杰·培根的科学实践精神,尝试用它来进一步化解乌伯蒂诺的宗教狂热。牛津大学在中世纪的英国横空出世,成为经验科学思想的摇篮,罗杰·培根就是它的拥趸。他与当时的有识之士一起,倡导自然哲学和经院哲学分离,拥护亚里士多德的物质原则,挑战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的唯上帝论。《玫瑰之名》中的威廉奉命前来修道院探案,他曾在牛津大学专门研究大自然,深受罗杰·培根的学术熏陶,以至于在其助手阿德索看来威廉言必称罗杰·培根。阿德索如此描述威廉:“在其他时节他说话时,表现出十分怀疑一般的思想,却非常尊重个别事物,以后他也有这种表现。”(埃科, 1987: 24)威廉继承了罗杰·培根的唯名论,认为客观实在性来自殊相,而不是出自共相,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观念。威廉正是采用唯名论思维,试图告诫乌伯蒂诺:上帝和敌基督是抽象之物,对它们过于痴迷而忽视现实性,是背离历史进程的矫枉过正之举。威廉在乌伯蒂诺面前这样来谈论罗杰·培根:“但他教导说,准备抵制魔王的到来,只有一条路:研究大自然的秘密,运用知识以便为人类造福。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草药治病的特性,研究石头的性质,甚至通过设计使你发笑的飞行机器,做好准备跟魔王作斗争。”(埃科, 1987: 69)此处的魔王与敌基督是同义词,它在威廉心中完全不是自然科学的对手,而后者才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比如罗杰·培根发明的眼镜就是威廉随身携带之物,使他在视力衰退的情形下照样阅读书籍和资料,成为他破解修道院凶杀案的必备工具。眼镜是当时的新兴事物,只有少数开明之士敢于尝试,领略到科学发明的实用价值。威廉与罗杰·培根都是方济各会的信徒,若称他们用唯物主义来消弭唯心主义,未免罔顾时代局限而言过其实。可是,他们希冀宗教神学与客观现实有机融合,从而更加符合人性的需求,却是不争的事实。可惜的是,乌伯蒂诺无法听从威廉的劝告,而是深陷宗教狂热的泥潭中,每次谈论教义教派都激情四溢、泪流满面。他在威廉的帮助下逃出本笃会修道院,没有在当时死于非命,但多年后在德国被暗杀,成为宗教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湮灭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尽管现实中的罗杰·培根经受过10年幽禁生涯和14年牢狱之灾,他遭遇的宗教残害与小说中的乌伯蒂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立足于自然哲学和科学实践来信奉神学,为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型尽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元素。

2 知识狂热:“过分的占有欲”

《玫瑰之名》里的图书馆规模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中世纪实际建筑,从物质空间上确立了某些僧侣陷入知识狂热的可能性。埃科从1964年起担任米兰大学建筑系教授,讲解“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理论。他关注建筑中的“符号”问题,考察建筑传达的社会意识形态方式。埃科花费整整一年时间来构建《玫瑰之名》的修道院视域图,详细设计了总平面图和楼层平面图,正如他在小说后记中所说:“曾翻遍建筑百科全书,长时间研究其中的建筑图片和设计图,以便为修道院画出设计图,确定其间的距离,直到螺旋梯的台阶数。”(Eco, 1983: 513)为此,他研读了其他中世纪修道院建筑图,并深受圣格尔修道院(St. Gall)重建设计图的影响。历史上的圣格尔修道院于7世纪初建

成,于9世纪初准备重建,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付诸实施,致使40张美妙精巧的重建设计图束之高阁。《玫瑰之名》至少三次提及圣格尔修道院,是为了将它当作中世纪建筑标本来反观小说中的修道院,审视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偏离,以及后者有违本笃会教规的意义何在。小说中图书馆所在的塔楼“是雄伟的建筑”,一百多年前诺瓦利萨修道院夸耀有六千册古书抄本,跟这里的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埃科,1987:32)。用于学习活动的图书馆和缮写室位于塔楼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与宗教活动所在的教堂分隔两地,象征着教育与宗教分离的管理体系。图书馆拥有宏伟的建筑与惊人的藏书,对一些僧侣产生巨大吸引力,致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制于图书馆而非教堂。就圣格尔修道院建筑图而言,其图书馆和缮写室位于教堂内部,而且它们功能微弱、空间逼仄:“尽管圣格尔并不排斥学习,但学习活动的地位在宗教活动之下,修道院里供给学习的空间极为有限……这块儿区域仅占教堂总面积不到5%,有力地证明了圣格尔修道院里学习与礼拜的比重。”(Hallissy, 2001: 276)显然,真实存在的圣格尔修道院谨遵本笃会教规,将图书馆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反衬了《玫瑰之名》对中世纪建筑传统的疏离,展示埃科笔下“巴别图书馆”的虚构性,不但渲染了小说的历史书写基调,还为知识受到过度信仰埋下伏笔。

实际上,小说中知识狂热的情形甚嚣尘上,以至于非理性和非人道之事层出不穷。对书籍过分占有就是知识狂热的一种表现,它拒绝图书流入外界,让珍本沦为尘封的故纸堆。修道院即使经历了蛮族入侵的毁灭性洗劫,一代代修士也千年不变地痴迷于书本,“邪恶地希望有朝一日侵犯它所有的秘密”(埃科,1997:214)。正如宗教狂热者为了纯洁信仰而无所不用其极,知识狂热者也力求学问的所谓纯洁性,竟不惜一切手段去封存书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把图书馆设计成迷宫,防止人们擅自进入:“图书馆得以安排布局的设计图,几百年来仍然模糊不清,也并不要求任何修道士知道这个图样。”(埃科,1987:35)只有图书馆长知晓路径并畅通无阻,他在有生之年再私相传授给馆长助理,此外别无他人获得这个秘诀。倘若哪位修士需要借阅某本书来完成缮写工作,必须求助于图书馆长,唯有他对每本书的位置和内容了如指掌,有权决定是否出借,以及怎样给、何时给。这种禁锢反而激起僧侣们的好奇心,促使他们铤而走险,甚至为占有书籍出卖肉体或者犯罪。修士阿德尔摩是年轻的书稿装饰家,他因技艺超群而声名鹊起。为了一睹图书馆中传闻已久的禁书,他被同性恋修士诱逼与之暗度陈仓。他在极度羞愧中前去忏悔,又受到宗教狂热者约尔格推波助澜,致使他跳崖身亡,成为故事中书籍引发的第一个受害者。对书籍实行封锁无疑是不道德行为,其中的反人文主义倾向一目了然。就像威廉所总结的那样:“书的价值在于被人阅读……要是没有人读,一本书的符号就形成不了任何概念,因而这本书就如同一个哑巴。”(埃科,1987:478-479)

知识狂热还体现在否认知识本身的流动性,截然二分所谓“异教徒”和基督徒的学识。勒克莱克认为,“异教徒”留存数量丰富、价值不菲的古典文献,所以中世纪基督教学者也阅读“异教徒”著作,将其中的有利因素为己所用,同时剔除那些不利因素,以便将“最危险”的作者改造过来(Leclercq, 1982: 143)。《玫瑰之名》中的图书馆与此类似,基督徒和“异教徒”书籍兼而有之,但遵循二元对立原则,对潜在的异质性严防死守:“只有图书馆长从书籍的上下文和可理解的程度才知道书籍包含着什么秘密、什么真理和谬误。”(埃科,1987:35)根据这样的唯一真理观,修道院得出了自以为是的论断,成为界定“异教徒”谬误的铁律:《圣经》中的基督从来都不笑,所以但凡宣扬笑与诙谐的喜剧因子,都挑战了基督的严肃性和神圣性,都该被当作异端邪说。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论及诙谐的谜语,被图书馆列为禁书并失传已久。非洲诗人也用诙谐的语言创作谜语,其作品

却神秘丢失了。诸如此类的荒唐事数不胜数,折射了中世纪《圣经》阐释权引起的血腥之争。那时解经之风盛行,修道院聚集了最博学的僧侣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巩固这一诠释权,一方面要垄断知识、让知识为解经服务,由此衍生出‘禁书’和‘被禁止的知识’;另一方面则要使诠释复杂化和专门化,所以隐喻解经大行其道。”(马凌,2003:36)可见,“异教徒”及其“禁书”的评判缺乏科学依据,而是修辞隐喻和权力斗争所致。外来者威廉对这一点洞若观火,因而游离于这所图书馆的清规戒律之外,坚称“好的基督教徒有时从异教徒那里也能学到东西”(埃科,1987:9)。这契合了阿奎纳的论断:若允许“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就会保护更大的善,所以对“异教徒”应该持宽容姿态(阿奎那,1963:132-133)。《玫瑰之名》也不乏阿奎纳的辩证性知识论:“神圣的事情用邪恶的躯体的形象阐发比用崇高身躯的形象,会更清楚、恰当些。”(埃科,1987:91)阿奎纳以《神学大全》著称于世,他是13世纪的文化英雄,把理性和自然法则引进经院哲学,是中世纪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者。作为埃科博士论文《圣·托马斯的美学问题》的研究对象,阿奎纳频频显现于小说人物的对话和辩论中,足见埃科向阿奎纳致敬的意味。威廉也对阿奎纳敬仰有加,他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都秉持多元共享的真理评价体系,倡导知识的流动性和开放性。

《玫瑰之名》中修道院的知识狂热还有攫取金钱的目的,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语境不无关系。在故事发生的14世纪,欧洲的城市和市民社会已经兴起,社会变革与转型趋势越发明显。“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一些离开了土地而专门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人成了早期的城市市民。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恰恰在这些早期的城市市民中,产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刘建军,2005:93)当时的意大利并不是完整国家,但商业和贸易却处于西欧领先地位,日益引发人们对金钱的兴趣,连修道院也不能幸免。《玫瑰之名》的地理背景处于意大利北部,是通往法国普罗旺斯的交通要道。即使在如此偏僻的地区,修道院也抵制不了山下城市物质利益的诱惑。相比于方济各会修道院的贫穷,本笃会修道院可谓富甲一方,修士们可以在这里享受饕餮大餐,把宣传贫穷的言论斥责为异端邪说。他们的财富不仅来自长年累月接受的馈赠,更是知识与金钱交易的结果。比如,维南蒂乌斯受命翻译一部寓言著作,因为“修道院是应米兰领主的要求办这件事的,从中可以获得东边一些农户生产酒的优先权。”(埃科,1987:146)掌权者“要把修道院的整个结构,以及图书馆本身都变成赚钱的作坊、工厂。”(埃科,1987:144)可见,知识狂热的实质是“过分的占有欲和好奇心”(埃科,1987:215),会引起道德混乱和行为失序。社会转型导致身份焦虑,人们原先赖以生存的法则已不再适用,新的精神共同体尚未出现,连博学虔诚的修士都难逃危机。罗杰·培根认为,学习知识的动机应该是造福民众,绝非为了满足种种贪欲(埃科,1987:478)。这样的引述来自威廉之口,尽显人文特质和现代思想,不得不说是对其修道院乱象的匡正。

3 语言狂热:“偷盗者在重复陈词滥调”

宗教狂热和知识狂热往往利用过度阐释证明其合法性,形成不可自拔的语言狂热现象,受到埃科及其《玫瑰之名》的警觉和反对。过度阐释这个概念由埃科首次提出,源于1990年他与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等三位学者的辩论会。这次辩论事关阐释的有限性议题,事后结集出版《阐释与过度阐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卡勒认为阐释只有过度时才富含魅力,而埃科则强调小说可以有限度地开放,其阐释要接受文本意图的约束(艾柯等,1997:9)。《玫瑰之名》接近尾声时,埃科把语言阐释比作梯子:“我们心里想象的那个秩序就像一张网,或像一架梯子,是为得

到什么而编造的,但你以后必须把梯子扔掉,因为即使你发现它有用,它也是毫无意义的。”(埃科,1987:606)约翰·丘吉尔把这架梯子与“维特根斯坦的梯子”相提并论,强调语言是服务于特定哲学命题的媒介,一旦现实语境产生变更,那么原来的语言就只能弃之不用(Churchill,1984:21)。玛乔瑞·帕洛夫也用维特根斯坦的梯子意象强化语境的重要性:一个人无法两次爬上同一架梯子,由语言建构的哲学逻辑也各不相同,因为使用语言的具体时空已悄然变化(Perloff,1996:IV)。埃科反对过度阐释、注重阐释的历史维度,其笔端的梯子契合维特根斯坦的本意,也就是强调语言和语境的相互协调。

《玫瑰之名》中的语言狂热现象比比皆是,尤其体现于掌权者因不良动机而巧舌如簧。修道院里到处是饱学之士,尽管迫于教会的威慑力而常常三缄其口,但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是动辄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修道院院长是这里的最高权威,其次是图书馆馆长,前者年事已高时常由后者晋升接替。阿博却是个例外,直接从当地领主的儿子一跃成为院长,而且一做就是30年,据说缘于一桩荣耀辉煌的事情:“他年轻时曾经照料过圣托马斯,后来圣托马斯死后,他负责将那伟大的尸体从一座塔上抬下来,尽管抬的时候是那么艰难……”(埃科,1987:511)事件的真伪恐怕只有阿博本人最清楚,很有可能是他自己或扶持他的人造势,因为修士们“对之议论纷纷”,显然对这样的宣传并不信服。过度阐释造成语言的裂缝和语境的疏远:其一,阿博被火线提拔不符合教会规定,而且前任院长保罗莫名失踪,前任图书馆馆长罗伯特重病缠身,就好像一切“巧合”都是为阿博精心准备;其二,阿博理应是阿奎纳的忠实追随者,事实上却毫无圣徒的品性和业绩,他视财如命、囤积居奇,他麾下的修道院人心涣散、凶案频发。威廉奉教会之命前来调查案子,在修道院遇见的第一个语言狂热者就是阿博,他滔滔不绝地夸耀修道院如何富有和繁荣,治理有方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威廉后来在修道院地下室看到阿博炫耀的奇珍异宝,“这里的任何一件东西,哪怕是最不起眼的,都会使一个皇帝去用一个或者更多的城堡来换取。”(埃科,1987:514)所有东西都特别标注了说明,除了珍珠宝石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圣物”,诸如施洗者约翰的一颗牙齿和12岁时的头颅骨,摩西的棍杖,圣母玛利亚结婚礼服上的饰带,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受刑时不止12岁,其他“圣物”及其语言说明的可靠性也被质疑,过度阐释的情形跃然纸上。院长坐拥价值连城的财富,这个职位引起修道院明争暗斗,觊觎和厮杀充斥其间。显而易见,此处的语言狂热是为权力和财富保驾护航,过度阐释只是表象,其真正用意是以繁复的言辞掩盖不法手段。

修道院和图书馆的真正掌控者是约尔格,他是连环谋杀案的策划者,也是小说中最执着的语言狂热者。有学者认为约尔格的原型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是埃科向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巨匠致敬,用巴别图书馆、盲人图书馆馆长、迷宫、镜子等意象展示互文效果(Hallissy,2001:279-280)。笔者认可这两个人物之间互为影射的关系,但更关注埃科如何让约尔格背离博尔赫斯,以及他如何以巧言令色来固守所谓的“唯一真理”和“千年盛世”,从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倒退势力。约尔格从小博闻强记,熟读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直至80来岁早就双目失明,还让见习修士一连几小时读书给他听。他年轻时被派回家乡法国收集最精美的《启示录》文稿,发现并偷盗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这个珍本使得约尔格在修道院名声大振,一举当上了图书馆馆长,而此职务本应当属于比他年长十岁的阿利纳多。约尔格接着制造舆论说这本书已失传,实际上被他藏在图书馆隐秘角落“非洲的终结”,与有关非洲、动物、光学等“异端书目”并置。当意识到自己的眼睛濒临失明,他把院长和馆长之职安排给可信赖之人,以便继续操纵图书馆。作为爱书如命的学究,约尔格没有毁了这本书,而

是将它装帧成阿拉伯文的假象,将希腊文的亚里士多德孤本藏于其中,并在书页间涂上毒药,令有意或无意翻阅这部分内容者都中毒身亡。约尔格的语言狂热症状比阿博更强烈,动不动就会从图书馆的角落里冒出来,长篇大论地阐述或辩论某个议题。当他向威廉陈述为何因一本书杀人如麻时,照样是连篇累牍、不可遏止的架势。大致意思如下:第一,世上关于笑和喜剧的书很多,唯有亚里士多德的“每一部书都使基督教几世纪来所积累的学说有一部分被毁于一旦”。连圣托马斯都受了他的诱惑,引导世人用自然推理的方式重新看待世界。第二,书里关于笑的讨论令人惊恐不安,是因为狂欢化“被上升为艺术”,颠倒了俗人和圣人、隶农和雇主、边缘和中心的关系,连罗杰·培根都相信“人们能在尘世得到安乐富足”。第三,如果对笑放任自流,那么总有一天它会嘲笑神灵、亵渎上帝,逾越最后的界限。他约尔格之所以这样做,实则是在替天行道(埃科,1987:582-590)。约尔格用阿奎纳抱怨亚里士多德对基督教神学的动摇,用罗杰·培根诟病“笑”对现实性和世俗性的恢复功能,不知不觉消耗了自我辩解的立足点,增强了反方观点的合理性。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转型和变革在所难免,约尔格即使明白大势已去,也要用疯狂的言辞和行动反抗到底,被威廉谴责为“所谓的真理诠释者只不过是个顽冥愚钝的偷盗者在重复陈词滥调而已”(埃科,1987:589)。

作为《玫瑰之名》中激进信仰的主要表征之一,语言狂热映射出中世纪末精神生活的社会目的性正日益加强。因语言的自然属性争论不休,几乎对每一代学者而言都司空见惯,比如:“修辞学家加班杜斯和特伦蒂乌斯就‘ego’(我)的呼格辩论了十五天十五夜,最后他们刀剑相见。”(埃科,1987:373)相对于这两位修辞学家为语言本身而战,《玫瑰之名》修道院中各色人等利用过度阐释而争,遮蔽不可告人的复杂动机。宗教裁判官伯纳德用语言狂热来渲染异教徒和情感欲望之恶,他的真正意图不是来修道院断案和擒凶,而是到教廷上刻意歪曲受审教徒的言辞,以便把他们送上火刑架烧死。马拉奇不懂希腊文和阿拉伯文,除了模仿这两种文字的书法抄录手稿,对所写内容根本一窍不通。他多年来言之凿凿、苦心经营,维护自己图书馆馆长的身份,掩盖滥竽充数的实质,却掩盖不了他是约尔格言听计从傀儡的真相。他们和约尔格、阿博等人相仿,尽管都是阐释技巧的玩家,但难免有时候弄巧成拙,使语言和语境不合拍而自揭其短。语言不再是单纯透明的中介,而演变为谋求财富或统治权的话语策略,这也是中世纪后期一些有识之士跨出蒙昧、迈向近现代的征兆之一。

4 结语

文学是艺术虚构和历史事实的结合体,本文厘清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揭开其神秘而诗意的层层面纱,还原文学书写中的文化政治语境,从文学想象走向历史真实。《玫瑰之名》聚焦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运动转型的文化语境,揭示了进步人文主义与保守封建主义的角力。在商业经济和市民阶层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主人公威廉无疑生逢其时,成为社会思潮的有力响应者。他汲取了罗杰·培根和阿奎纳等人的理性思维,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修道院追凶过程中表现出过人的智慧和胆识。他认同进步经院哲学主张:神学教义和世俗社会具有同构性,都处于动态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不是绝对和最终的结果,所以基督教不该是亘古不变的永久法则,更不该是信仰激进者伤害自身或他人的理论工具。在批判修道院里宗教狂热、知识狂热和语言狂热等众生相时,《玫瑰之名》尽显不可靠叙事、自我指涉、复调、互文、戏仿、拼贴等后现代元小说策略,俨然制造出中世纪和当代的混响音效。它是事实和虚构交织的文学文本,是埃科为中世纪僧侣文化想象的一曲

挽歌,也是他为文艺复兴时代构想的序幕。

参考文献:

- Churchill, John. 1984. Wittgenstein's Ladder [J]. *American Notes and Queries* (1-2): 21.
- Eco, Umberto. 1983. *The Name of the Rose and "Postscript to The Name of the Rose"* [M]. William Weaver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513.
- Hallissy, Margaret. 2001. Reading the Plans: The Architectural Drawings in Umberto Eco's *The Name of the Rose* [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3): 271-286.
- Leclercq, Jean. 1982. *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for God: A Study of Monastic Culture* [M]. New York: Fordham UP, 143.
- Perloff, Majorie. 1996. *Wittgenstein's Ladder: Poetic Language and the Strangeness of the Ordinary*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IV.
- 昂贝托·埃科. 1987. 玫瑰之名[M]. 林泰,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 克尔凯郭尔. 1994. 恐惧与颤栗[M]. 刘继,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刘建军. 1997. 论西欧中世纪文化中的变革因子[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67-71.
- 刘建军. 2005. 历史文化发展新坐标上的中世纪精神范本——《列那狐的故事》思想与艺术分析[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92-99.
- 马克思,恩格斯. 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凌. 2003. 诠释、过度诠释与逻各斯——略论《玫瑰之名》的深层主题[J]. 外国文学评论(1): 34-40.
- 托马斯·阿奎那. 1963.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 马清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翁贝托·艾柯. 1997. 诠释与过度诠释[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Renaissance: The Anxiety over Transition in *The Name of the Rose*

JING Xingmei

Abstract: *The Name of the Rose* is characterized of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containing both postmodern writing techniques and European reali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demystify and recontextualize *The Name of the Rose* to explore history and politics at that time. It focuses o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Renaissance in which western Europe was in chao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citizens and commercialization emerg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resulting in the value diversion inside the church and constant struggle among monastics as ruling class. Roger Bacon and Thomas Aquinas as two cultural heroes in the Middle Ages are repeatedly discussed in this novel to deconstruct fanaticism in religion, knowledge and language. They apply Aristotle's ideas to fighting against decadent system in monasteries and promoting science and humanism, which proves social r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re necessary in history.

Key words: *The Name of the Rose*; the Middle Ages; the Renaissance; the anxiety over transition

责任编辑:肖谊